

# 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宋儒哲学 对越南儒士思想的影响

阮氏翠幸

(越南河内师范大学)

**[摘要]** 中国儒学是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一种集政治和道德为一体的学说,其形成与发展历程影响了东亚众多国家,其中包括越南。越南接受儒学历史基本上只接受了宋明儒学(亦即宋明理学)。文章要解答的历史疑问集中于:为何宋明儒学影响最大,并非儒学发达的春秋或是中国文明最发达的唐代儒学。13世纪至19世纪越南儒士对宋儒学说的接受是以三个主要特性为中心的。这是中世纪中古时代的典型影响方式。

**[关键词]** 宋明理学;越南的儒学接受;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

**[中图分类号]** B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5-0011-05

中国儒学在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的传播中,具有独特的历史语境,主要表现为:中世纪亚洲的“士”阶层的形象传播极广,这当然是由于这个阶层所独有的“君子自强不息”的君子品格体现为一种人格魅力,对东亚东南亚文化有极为深远的作用。越南在13到19世纪,基本上形成了本土化的儒学,也产生了本土化的“士人”,士人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与儒学有密切关系。研究这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产生及其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果从历史时期来看,是所谓“新儒家”或是说宋明理学在越南传播最为集中。那么,为什么是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他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1279年)最繁荣的年代了。”<sup>[1]</sup>

宋明理学有哪些特征并且如何影响15世纪至18世纪的历代越南儒士思想?本文力图概括上述问题,从中找出答案。

## 一、宋明理学思想的形成 及其在越南的传播

关于宋明理学的来源,中国研究及国际学术界均认为,宋代之前的儒学总体上是没有宇宙论的。因为孔子创始的原始儒学偏重于道德伦理的研究,

只涉及简单的宇宙观要素。汉、唐时期,儒学虽被尊为国教,但因重视实际及社会伦理而不是创建哲学的宇宙论,儒学也因而并不是一个完备的哲学系统。到了宋代,邵雍(1011—1077年)、周敦颐(1017—1073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及朱熹(1130—1200年)等大儒开始关注形而上学,将孔子的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哲学范畴互相融合。因此,宋儒的哲学被中国哲学史家称为新儒学(néo-confucianisme)、道学或理学。“理”经常出现在《易经》:“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君子黄中通理”等等。到了宋代,“理”被学者们广义理解:宇宙论有“理气”、心体论有“性即理”、方法论有“存天理,灭人欲”。与重视实用性、提高君子道德准则的传统儒学相比,宋明理学家更突出了三个特征:其一,深入形而上学的哲学认识论、本体论的探讨;其二,重视个人修养、世界观与思想观念的探讨;其三,修心养性以成圣人,这显然与隋唐以来佛教修炼成佛的方法相似。

宋儒不仅对中华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朝鲜,宋儒对该国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长达五百多年(1392—1910年期间),甚至到了近代。在日本,宋儒对该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收稿日期]** 2017-06-20

**[作者简介]** 阮氏翠幸(1987—),女,越南河内人,讲师。

特别是江户时代(1600—1868年)。在越南,虽然传入也较早,但宋儒主要对后黎朝时代(1428—1784年)及阮朝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创建了越南儒学鼎盛期。总之,15世纪以后,宋儒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各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其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在越南,儒学的影响以强迫接受和自愿接受等两种方式传入和演变。北属初期,锡光、任延、士燮等中华封建王朝官员极力推动传播儒学。然而,因儒家文化是外来的,它具有被强迫接受的性质,而且这时期正在北属抵抗时期,儒学在越南文化中尚未占立地位。到了1070年,李圣宗下令建筑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从此,儒学在越南正式得以接受。此时,在中国正是宋朝时期(960—1279年)。因而,李圣宗及其后的越南儒学以宋儒为主,并非汉儒、唐儒、明儒或清儒。

胡朝年间,明朝文化力量深入越南,并将宋儒传播世俗化,使得宋儒在越南日趋泛化。黎朝作为独立国家取得政权之后,宋儒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逐渐占据独尊地位。这一变化直到明代的政治势力退出越南之后,黎朝正式建立(1428年),着手创建并发展民族独立文化。黎太宗于甲寅年(1434年)登基,朝廷召集众臣商讨举行进士考试大事,这也是越南推行科举制度的开始。科举是儒学的重要内容,越南也制定了乡考、会考等不同级别考试的条例及其规则。然而,到了壬戌年(1442年)三月,黎仁宗才正式在龙庭举行对策考试予以选拔进士,建筑了进士碑,讲述举行进士考试一事、将排名第一的考生姓名铭刻于碑上。壬戌年进士考试是为儒学在15世纪的越南确立独尊地位的重要里程碑。

在中世纪的越南文化背景下,宋儒何以存在?潘玉教授认为:“于1075年进行第一次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明经博学者当官吏,这一时间在中国是宋朝时代。总体上的文化接受就是当时文化的接受。这样一来,越南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宋儒。到了陈朝,朱文安编撰了《四书说约》。四书创始人为南宋第一大学者朱熹(1130—1200年)。朱熹是从120部典籍当中选出了《论语》、《孟子》、《大学》及《中庸》等四本著作,将其命名为《四书》。作为儒学核心典籍的第一个人,朱熹之前尚无四书概念。如此看来,在儒学接受历史过程中,越南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才选择了儒学。而其鼎盛期是16世纪的黎圣宗年间和19世纪的阮朝年间。”<sup>[2]</sup>

宋儒之所以在中华和越南均占有优势地位是因为宋儒为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包括宇宙、政治、生活、家庭以及社会各种关系在内的一个贯穿性的解释方法。虽然存在着封建保守、不肯承认实验科学、极端教条、不切实际等缺陷,但是宋儒彰显了中国国家统一、文化发达的伟大形象,特别是10世纪之后,政治与军事上并不强大的宋代,却到了文化思想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

## 二、13世纪至19世纪越南儒士 对宋儒学说的接受

当然最早的儒学其实从汉以来就成为越南的统治思想,从元前二世纪起,越南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首先进入的当然是汉字的输入与传播。然而在文字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为巨大的力量——文化,具体来说即儒家思想文化。从此以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也开始盛行起来。特别是在1407年至1428年,中国明朝文化基本统治越南,儒家思想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此阶段在越南传播的中国经典书籍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孝顺事实》。其中《性理大全》辑成于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由明成祖亲撰序言。此书为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汇编,所采宋儒之说共一百二十家。前二十五卷收入宋儒著作九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张载的《西铭》,张载的《正蒙》,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朱熹的《易学启蒙》,朱熹的《家礼》,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蔡忱的《洪范皇极内篇》。第二十六卷以后分十三个专题汇编各家言论: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每一专题又下设小类,共一百三十多类。《性理大全》汇集了宋朝学者《理学》著作中的经典评语,为宋朝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可见,宋儒哲学的主要内容及信仰基本上通过《性理大全》传入越南。从此以后,宋儒正式被越南儒士学习、运用。对于老百姓,明朝采取了多种教训措施,传播儒学的训条。明朝长达二十年的努力已获得了一定的成果,既为在越南深广传播宋儒思想奠定基础,又培育了尊崇宋儒思想的强大儒士阶层。

陈朝(1225—1400年)末年和胡朝(1400—1407年),宋儒虽然在越南传播深广,但其思想比较模糊。存留下来的一些著作证明,陈朝的知识阶层都接受了儒学的《易经》及阴阳论,且将其运用于越南国情(例如陈仁宗、陈日鹞、陈明宗、陈太宗、史熹

颜、黎文休、范思孟、陶师锡、阮伯静等等)。易学影响了他们著作的词语、形象或诗句等方面。他们引进了“阴阳”、“乾坤”、“否泰”、“气”等概念讲述了政治、时局以及大自然的运转。越南封建社会儒士非常关注天、天命与人等问题。据他们的理解,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变迁皆在天地变化之中。陈朝著名儒家、医师阮伯静曰:“三才是指天、地、人。人受到天地的正气,所以他比万物精明”。<sup>[3]</sup>

然而,总体上看,此时的学者们的知识还不够成熟予以开展自我对《易经》的诠释。他们忠诚于宋朝的诠释作品,少有自己的诠释作品或评语。对于这一时代的大部分越南儒士来说,研究《易经》是为了考试,因为四书五经是教育及考试的主要内容。此外,《易经》主要被视为一本算卦著作,想预测时就用。

胡朝时(1400—1407年),出现了一位独特的学者——胡季犛(1336—?),他精通宋儒著作,并以批评性精神对其进行了评价。他对程朱理学的一些繁文缛节十分反感。1932年,胡季犛编写了《明道书》,该书共十四篇。将周公称为先圣、孔子称为先师,对《论语》中有四处真实性十分可疑,分别是子见南子(《论语/雍也第六》)、在陈绝粮(《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公山(《论语/阳货第十七》)、佛肸子欲往(《论语/阳货第十七》)。同时胡季犛称韩愈为盗儒,并对程朱理学进行抨击,认为他们迂腐,一味地抄袭和剽窃古人的东西。这遭到了当时大多数儒者的非议,但却受到了太上皇陈艺宗的嘉奖。由于胡季犛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书中的内容和主张与《朱子集传》有很大不同。虽然胡季犛的举动受到了后世越南封建学者的猛烈抨击,如:潘孚先、吴士连、吴时仕、陈仲金,但现代越南学者认为其有一定进步意义。另一位胡朝博士李子璉也对朱熹、周敦颐的学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沿做濂溪仿考亭,讨论石古钉盘铭。”(慢兴)此阶段,宋明理学虽然开始发展,但还仍只是处于初期阶段。

黎朝时(1428—1789年),除了儒家经学和文学辞章,还有“义理学”——主要是宋儒的理学有进一步发展。此阶段,不少学者对“理学”表示了关心。历史学家吴士连(1400—1497年)使用“气”的概念(“理气”)来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从此,涉及到君道。他曾说过:“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尔。人君致中和则天地立焉万物育焉而其气和非臣子谋君父则夷狄侵中国之兆,凡有国者谨天戒尽人事回天变之道也。”黎圣宗(1442—1497年)也是用心研究“理学”的人。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帝在行闲

常与杜润语及道理二字谓道者常然之事明白,易知理者所以然之故微妙难见。朕常作此二诗积日而成杜润对日皇上理学习熙于溷然之中有灿然之别。”<sup>[5]</sup>

黎圣宗和申仁忠、杜润等身边大臣以及骚坛人物都深受宋儒学术影响。他们关心理学,茶余酒后经常讨论理学。然而,黎圣宗年间,理学及宋儒学术有关的朦胧哲学问题只在朝廷之中上层知识阶层流行。对于布衣儒士,宋儒仍是一个实用科举的学习,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考试,研究易经、理学是为了运用于日常生活。他们不关心形而上和书面考察等问题。

16世纪时,儒家思想在越南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阮秉谦(1491—1585年)。阮秉谦研究儒家思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阮秉谦不把“理一气”“理一欲”关系范畴当作重心。相反他从人的立场出发,主张满足人的“所欲”。二程用《易经》解释《宇宙》:《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与二程的观念相反,阮秉谦肯定“太极”,他认为:“地”与“人”是由气的重性或经性构成:“太极初兆分。三才定决位。轻清上为天。重浊下为地。中集而为人。禀受是一气。”当然,阮秉谦的贡献不是创造出一个新的思想,而是从国家人民的立场来吸取儒家思想的合理之处,接受与优选儒教思想的合理要素。

据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越南历史上,陈朝朱文安善于道学;十六世纪出现了阮秉谦,十八世纪出现了黎贵惇、罗山夫子阮贴及学术派;阮朝末年出现了黎文语,其代表著作为《周易九元》。吴时士、郑慧、黎贵惇、潘慧锡、黎友桥(尊崇道教,后供奉佛)、黎辉莺、罗山夫子阮贴(曾用工炼丹)等许多十八世纪名儒虽然尊崇道家、道教思想,但也融合了儒——佛一道。关于阮秉谦和阮贴,两位均研究宋朝理学。阮贴注重于心性,即伦理、道德之实行。阮秉谦却追求理气,深入研究天地起源、矛盾属性、事物恒常对立、流动原理、万物转化等哲学形而上问题。当然,阮秉谦对人及其本性的看待仍是认可“天真”、“天性”、“天理人欲”等观点。越南历史实际证明,当士阶层形成并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宋儒思想、八大家文学也随之成为典范,作为学习及考试的标准。哲学家兼诗人成为高人楷模。所谓的哲学家是区别于从事科学、学术之人,并非思想创新者。与当哲学家相比,此类高人更偏向于指诗人。阮秉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这阶段,除了阮秉谦,精通道教的越南学者

还有吴时壬(1746—1803年),郑穗(1746—1803年),黎贵惇(1726—1784年),黎有暉(1720—1791年),其中黎贵惇是一个独特的越南思想家。他已经以自己的博学丰富的见闻来认识了解宋儒。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邵雍的象数学对黎贵惇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他的《太乙易简录》与《易经肤说》两本书表明他对周敦颐、邵雍的思想已经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他也关心二程的“性理”与“性命”学说。他称赞程朱理学是“明显的本体”,“得到的实用”。此外,他还说程朱理学跟魏晋南北朝佛道的“清谈”以及梁朝佛教的“苦空”观念一样,在实践性方面有很大的欠缺。跟17世纪以前的儒学学者一样,黎贵惇也提倡朱熹的学说。在此之前,吴士连认为“朱熹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黎贵惇肯定:“在宋儒历史上,朱子有最高的地位”。此外,黎贵惇说:“说人,朱子是大贤,而象山(陆九渊)也是一位贤人”。这样,黎贵惇用他宽广的知识,博大的思想来研究宋代哲学。他从考证学的角度来理解宋代理学的优点以及它与它流派的区别。概括起来,他不仅接受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而且也接受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17世纪,吴时壬<sup>①</sup>是陈朝竹林禅派的继承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他主张儒教、道教与佛教的结合。他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同时受到了禅宗佛教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本体是“佛性”,是“真如”,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此外,他也使用了宋儒哲学的重要因素,来解释世界的本原与运动。认为世界具有统一性,世界统一于物质,“一贯”,从“万”都归“一”。吴时壬对本体“无”的解释表现在禅宗精神与宋儒思想的结合。他认为“无”是万事万物的起源与本质,“无”是不生不灭。同时,他对宋儒的观点表示同意,他说“无”是“太极”,是“浑源气”。吴时壬的研究方法是从佛教的角度出发,使用宋儒的关键概念,如“心”,“性”,“理”,“欲”来认识与解释事物现象的运动。总的来看,在越南封建时代时期,学者们的思想潮流是“儒佛道融合”,特别是吴时壬,这一点在他的本体论思想,认识论层面,三教的融合的思想上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教思想,人心修养首位重要。这也是儒、佛、道拉近距离、走向互相融合的共同点。儒学状元郑慧曾经论述了三教人心修养当中的相同之处,通过

宋儒“理”这一范畴论证了信仰相同性质以及儒、佛、道修养法的贯通:“养心养性,展开大型纲领,维护教育,是儒教的性质。明显化心性,普渡众生,脱离凡尘,是佛教的理想。修炼得到,超出事物通常,赵然物外,这是道家的精神”<sup>②</sup>

### 三、19世纪以后的儒学

19世纪的阮朝(1802—1945年)是一个变乱与复杂的时代。阮朝初期(1802—1885年)时,儒教鼎盛,朝廷改善科举,提高儒教伦理。阮朝已经出版喃字翻译的儒教经典,其中有易经。朱熹与程颐的评注已经成为考试内容。有不少儒学的评注文本,如范贵適(1759—1825年)的“周易问解撮要”,汝伯士(1759—1840年)的“易系解说”

西方文明进入越南之后,儒教独尊的地位摇摇欲坠。知识界开始对儒教思想表示怀疑,代表是潘佩珠(1867—1940年)的《易学注解》,黎文敬(1859—?)的《周易究原》(1916年)

越南学者之前对朱熹的学说很忠诚。但面对阮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的影响,越南知识分子开始对朱熹学说的崇高的地位表示怀疑。其中黎文敬是一个典型代表。在这样的文化政治背景下,黎文敬展开了他对中国经典的新研究,同时不懂20世纪初越南儒教的地位。

黎文敬批评从东周(公元前771—221年)到清朝(1644—1911年)的学者们的评注文本。他像日本德川时代(Tokugawa, 1603—1868年)与中国清朝(1644—1912年)的学者们一样,他认为:“十翼”并不是由孔子撰写的”,在《系辞上》与《说卦》上,有不少荒唐情节。黎文敬否定汉儒与唐儒的价值,而肯定宋儒的地位,他认为:“宋儒是正学”。他肯定朱熹与程颐程颢对易学的贡献。一方面,他认为程颐的《易传》与《周易本义》是最出色的分析文本。另一方面,黎文敬也批评朱熹与程颐的评注并不完整,因为“他们只追问易经的本源而不解释易经的创作原理”<sup>③</sup>

黎文敬也不喜欢邵雍(1011—1077年)的占卜与玄学,同时,他漠视宋朝后期宋朝后期的易学。他像阮朝末年的学者们一样,批评朱熹与其他的宋儒学者的思想。但是他并不否定中国古代贤,而只批判后代儒士已经贻误了儒教的真元性。

① 《竹林宗指原声》的作者

② 参见《三教一原说》

③ 黎文敬,《周易究原》,41页

为了使越南儒学可以适应现代世界,黎文敬定义,怀疑,否定,甚至篡改“易经”的思想和其它的学说。这也是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东亚儒士对文化冲击最普遍的反击(Reaction of cultural),同时,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日本,朝鲜的易学家的主要思想潮流。

可以说,虽然《周易本义》不是易学奠基作品,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怀疑与反思的精神,开放的思想,以及对实践的推崇提高实现效(pragmaticism)。黎文敬并不是越南阮朝杰出的儒士,但是他放胆辩难宋儒,论西方思想,为越南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关于宋儒如何影响越南儒士思想的评估,有些研究者认为,与其之前的儒学相比,宋儒实际上是一个倒退。宋儒只是通过借鉴了佛、老某些范畴深入论述形而上,思想方面毫无贡献。然而,若将宋儒放在中国哲学逻辑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宋儒并非如此。本文所说的儒学,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儒学是一个动态结构、一个开放的系统,会随着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情况而不断发展、变迁和完善。原始儒学形而上部分稀少,只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道德、政治学说,关注了社会各种关系,其核心是人和为人之道等问题。汉朝,由于董仲舒大力提倡,儒学占据独尊的地位。魏晋朝,玄学兴起促使了儒、佛、道三鼎局面的形成,其中佛、道比儒更占据优势。因此,到了宋朝,儒士们要将儒、佛、道互相融合,进而创建形而上,即宇宙论这一部分,予以作为儒学修身处事学说之本。本质上,宋儒是集孔教形式、佛教方法论以及道教主要概念为一体的综合性学说。就思想创新而言,宋儒学者所采取的方法不能创出新贡献。然而,更重要的是,宋儒健全了儒学理论系统,为只有形而下单独存在数千年的儒学系统增添了形而上,使其成为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 四、结论

总体来说,13—19世纪越南儒教一直是宋儒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却是一种片面地接受。越南宋儒只重视发展词章科举,很少人能深究经书的哲学

内涵。一方面,注重实践性,提高政治,不深入研究哲学,也不太关注道德修养是越南儒教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不像中国儒教,越南儒教就像越南别思想类型一样,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相反的,在中国,宋儒有四大学派: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日本与韩国也受到宋儒的影响,但在两国,易学已经发展成考证派,像数派,占卜派,实行派的研究学派一样。实际上,因为没有多种思想流派,越南儒教单调片面,缺少了内在运动,缺少了反思哲学,缺少了方法论,缺少了学说争辩,而这些是哲学发展的基本条件。

此外,13世纪到19世纪时期,那些杰出的人物以独立与创新精神,对话与反批评的精神来接受儒教,一方面表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一方面体现自己的特色如:阮秉谦,黎贵惇,吴时壬,阮浹。对民族的特征文化与社会实际来说,他们继承与抽选宋儒的知识很适合。这也是越南两千年多的学者们的统一观点。

总体来说,可以肯定,中国儒教给了越南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一种世界观,一种认知与思维方式。但是,研究界主要从政治社会方面来研究越南儒教,而很少有研究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越南儒教。因此,宋儒认识论对越南儒教的影响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的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冯友兰. 冯友兰选集:上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23.
- [2] 潘玉. 探究《翹传》阮攸的艺术风格[M]. 越南:经年出版社,2007:56.
- [3] 阮伯静曰. 慧静全集[M]. 越南:古传中医会,1994:498.
- [4] 黎文休,潘孚先,吴士莲. 大越史记全书[M]. 越南: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2b.
- [5] 阮朝国史官.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M]. 越南:越南社会科学,(21):39/75.

(责任编辑:程晓芝)

(下转第24页)